

#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阿拉伯世界分裂之源

李 平 民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阿拉伯人代表侯赛因以通信的形式相互保证：阿拉伯人支持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而大英政府则支持除叙利亚西部及其他少数地区外的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统一。与此同时，英国又与法国暗中签订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皮克协定》，阿拉伯人依靠英国实现独立的梦想最终成为泡影。《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在阿拉伯世界播下了分裂和动荡的火种。

**关键词：**秘密协定；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德邦森报告书

**Abstract:** Although the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wa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either side, on June 5, 1916, Husayn launched the Arab Revolt against Turkey and in October declared himself "King of the Arabs." Following the British military defeat at the Dardanelles in 1915, the Foreign Office sought a new offensive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it thought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reassuring the French of Britain's intentions in the region. In February 1916,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was signed, which, contrary to the contents of the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proposed to partition the Middle East into French and British zones of control and interest. Under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Palestine was to be administered by an international "condominium" of the British, French, and Russians.

**Key words:** secret agreements, the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diplomacy and intrigue

**中图分类号：**D83.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5636 (2005) 06 - 0010 - 0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阿拉伯人代表与英国秘密谈判，达成共同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幻想依靠英国的支持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但战争胜利带给阿拉伯世界的却是被英、法瓜分的命运。《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为阿拉伯世界长期分裂、动荡播下了火种，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复兴留下了深刻启示。

## 一、瓜分阿拉伯世界是英国的既定目标

早在 17 世纪初，当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趋向衰落之际，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它对它的“遗产”的激烈争夺，它们通过战争强占领土，通过不平等条

约攫取治外法权，通过召开“东方问题”的国际会议协调侵略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协约国实现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梦想提供了机会。在俄国提出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区域的要求、意大利提出对巴尔干半岛西岸和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要求的同时，法国也迫不及待地提出它对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整个巴勒斯坦）的要求。

英国对巴勒斯坦也早有野心。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1882 年英国对埃及的军事占领，使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对英国更为重要。为保证运河的安全，英国早在 1906 年就把埃及的边界越过西奈半岛扩展到腊法和亚喀巴一线。英国的皇家工兵团以《开发巴勒斯坦基金会》的名义在 19 世纪末就已完成了对巴勒斯坦的全面考察，绘制了用于军事目的的

图。关于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说过，它是“通往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军事大门”。英国基钦纳勋爵在 1912 和 1913 年间已确信，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那末“北起海法和阿克，南达亚喀巴的南部叙利亚地区（即整个巴勒斯坦），从政治上和战略上考虑，对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将是一份必不可少的宝贵财产”。<sup>[1](p.3)</sup>

在法国提出它对叙利亚的要求的同时，英国的战时内阁委员会多次举行夺取“战利品”问题的会议，并于 1915 年 4 月 8 日从外交部、印度事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贸易委员会等部门任命一部分高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以东方问题专家、副外交大臣助理莫里斯·德邦森担任主席，专门讨论英国对土耳其的亚洲属地的要求。自 4 月中旬至 5 月底，德邦森委员会共举行了 13 次会议，最终正式提出了它的报告书，认为英国必须控制的地区是：从波斯湾到摩苏尔省最北部的整个伊拉克；从伊拉克到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其大致边界是：从南部穿过科威特—亚喀巴—塞得港（包括整个西奈半岛）一线，在北部从摩苏尔省的最北端向西南延伸，直抵德拉，再经太巴列湖北部到海岸，它包括阿克—德拉一线以南的整个东西巴勒斯坦。关于巴勒斯坦需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该报告提出两个基本理由：（一）英国需要一个从地中海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间地带，主要是方便波斯湾的运输和对付可能来自俄国的威胁；（二）不允许法国在毗邻红海、阿拉伯半岛和波斯地区获得任何立足点。<sup>[2](p.182)</sup>

《德邦森报告书》是英国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属地的详细计划及对战后中东新秩序的详细分析，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德邦森报告书》不仅分析了巴勒斯坦对英国控制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也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及英国夺取它将会遇到的“巨大困难”。他认识到法国将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最有力竞争对手，尽管“我们今日的盟友也许是我们明日的敌手”，但英国对于法国在巴勒斯坦的要求“绝对不能让步”。报告书虽然没有为英国夺取巴勒斯坦提出具体建议，但它认识到夺取巴勒斯坦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设想将会有一种反对力量使法国拥有巴勒斯坦的要求被拒绝……。这种反对力量是那样强大，使法国的要求相对于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而无效”。<sup>[3](p.207)</sup>

该报告书提出后，德邦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马克·赛克斯携带它立即被陆军大臣基钦纳派往中东，去寻找排除法国拥有巴勒斯坦的强大“反对力量”。英国所找到的排挤法国的强大“反对力量”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通过《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和《贝尔福宣言》，英国以帮助阿拉伯人独立和犹太人建

立民族家园为名排斥了法国，同时又以保护阿拉伯人的利益为借口反对犹太人把巴勒斯坦攫为己有；英国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以维护盟国法国的利益和帮助犹太人“回归锡安山”反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从而使《德邦森报告书》得以实现。

## 二、英国在中东战略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盟友”和“对手”的两难定位

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传教活动的影响下，叙利亚知识界，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徒，纷纷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印刷厂，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号召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提倡研究阿拉伯历史和文化，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19—20 世纪之交，一些志在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秘密组织开始成立，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

1911 和 1913 年先后出现了对阿拉伯民族运动影响最大的政治组织法塔特（青年阿拉伯协会）和阿赫德（盟约社）。前者的主要成员是上层知识界人士。后者的成员主要是陆军军官。1913 年，由法塔特发起，在巴黎召开了首届阿拉伯会议，出席者为不同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代表。这次会议为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它决心完全脱离土耳其、争取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决定利用战争形势争取独立时，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乘机对阿拉伯地区进行侵略的可能，因此，法塔特的高级委员会在赞同独立的决议案上加上了如下保留：“万一欧洲的阴谋看来是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本社团决定站在土耳其一边工作，为的是要抵制任何性质或任何方式的外国渗透。”同样地，这时住在埃及的阿赫德的领导人阿齐兹·米斯里也向阿赫德的主要成员下达警告，叫他们不要被唆使去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敌对行动，因为它的参战将使阿拉伯各省易被欧洲征服；他们势必要和土耳其站在一边，直到获得有效的保证来对付欧洲的阴谋。他说：“当外国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答复和听而不闻，而只是凝视窗外时，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以免他们的阴谋得逞。”<sup>[4](p.150)</sup>英国的东方官员们“感受到了阿拉伯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他们绝不允许阿拉伯民族独立的烈火任意燃烧。当时英国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斯托斯和和阿拉伯事务局局长克莱顿在土耳其参战不久同阿齐兹·米斯里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商谈有关发动阿拉伯人起义问题，他们得知阿拉伯人起义的中心将是美索不达米

亚,最终目标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统一,英国政府不允许他的谈判人答应阿拉伯人的要求。

土耳其参战后不久,英国就把施展阴谋的目标放在了侯赛因·伊本·阿里的身上。侯赛因出身于哈希姆家族,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37代后裔。他的许多祖先都曾因担任穆斯林圣地麦加的监护人而被称为谢里夫。侯赛因与土耳其统治者的矛盾由来已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他统治时期(1876—1909年)恢复专制制度,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迫害少数民族,他强迫一些他认为有可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有联系的阿拉伯家族领袖住在君士坦丁堡,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其中就有侯赛因。侯赛因作为人质在君士坦丁堡幽居了15年(1893—1908年)。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坚决请求下,哈米德任命侯赛因为汉志埃米尔和麦加谢里夫。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侯赛因已与汉志各部落相联合,牢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禁止青年土耳其党人干涉他的政务。

对英国来说,与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结盟,不仅具有巨大的军事意义,更有巨大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当时“世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仍然是十分深厚的”,而且它常常是殖民地人民团结斗争、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土耳其苏丹以哈里发的名义发出的“圣战”号召(1915年11月14日)有可能导致法国统治下的北非的穆斯林、英国统治下的埃及、苏丹和印度的穆斯林及俄国统治下的中亚细亚的穆斯林造反。对“圣战”号召的影响最为忧虑的是英国,当时它统治下的印度的穆斯林达7000万人,埃及和苏丹的穆斯林达1600万人,它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印度、埃及和苏丹的穆斯林,“们从精神上是忠于敌人和敌方拥有的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城的”。当时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哈定爵士以及英国驻苏丹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将军都为哈里发的“圣战”号召而忧虑,要求英国考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复杂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使穆斯林的朝圣活动停止,应该保证对协约国的穆斯林臣民开放,以显示这次战争和宗教信仰无关,并显示土耳其统治下的穆斯林与协约国的“友好”关系,欧洲人“绝不再发动或鼓励反对它们的信仰的十字军东征”。他们认为,“假若这两个圣城不在敌人手里,假若通向这里的道路得到保证,那么对帝国的危险就可以被排除。”侯赛因的哈希姆家族出身和拥有的圣城谢里夫头衔使侯赛因在阿拉伯半岛内外享有极高威望,皇家海军部的W·萨斯比亚上校对此曾有过描述,他说,假若在麦加的那个被普遍承认的“先知的后裔”发布“圣战”号召,“其影响将是不可预料的和无法估计的。……至少可以唤起整个阿拉伯世界。”<sup>[5](p.13)</sup>

英国需要侯赛因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即企图把侯赛因作为英国在中东侵略扩张的工具,英国可以自己在中东的侵略扩张披上“支持”、“同情”阿拉伯人的外衣,使阿拉伯人成为排挤法国和其他列强的强大“反对力量”。英国背着自己的盟友法、俄单独和侯赛因谈判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早策划鼓动阿拉伯人起义的是当时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钦纳勋爵,他早就知道侯赛因企图寻求英国的支持以摆脱土耳其的控制。当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8月2日同德国缔结秘密同盟条约,参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时,已经回国任陆军大臣的基钦纳于9月24日和10月31日发出了两封历史性的电报,开始了英国与侯赛因的谈判。在9月24日的电报中,基钦纳要斯托斯派密使到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亲王那里,询问他如果土耳其政府被德国牵入反对英国的战争,他和他父亲以及阿拉伯人将站在那一方。斯托斯立即派密使X携信前往麦加,10月中旬将斯托斯的信交给侯赛因。侯赛因对英国的代表表示了友好,但同时谨慎地试探了英国合作的条件。侯赛因告诉斯托斯的密使X说:“奥斯曼帝国对我们施之以仁,我们对她报之以义。……我的心对斯托斯是敞开的……,伸给我们一只援助的手,我们绝对不会帮助那些压迫者。相反的是,我们应该帮助那些行善的人。安拉给我们的圣诫是:对伊斯兰和穆斯林行善——除了安拉我们无所敬畏。”<sup>[6](pp.164-165)</sup>

得知侯赛因愿意同英国“密切联合”的友好态度后,基钦纳勋爵在10月31日的电报中,明确表达了对侯赛因的“许诺”:“假若阿拉伯民族在这场土耳其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帮助英国,英国将保证:不干预阿拉伯半岛事务,并帮助阿拉伯人反对一切外来侵略。”信中还说:“也许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种族的阿拉伯人将在麦加或者麦地那担任哈里发,在安拉的帮助下,现在发生的一切罪恶也许会彻底被消除。”<sup>[7](p.4)</sup>

基钦纳勋爵对侯赛因的“不干预阿拉伯半岛事务”和支持“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种族的阿拉伯人将在麦加或者麦地那担任哈里发”的许诺是与《德邦森报告书》的基调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德邦森报告书》不仅强调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是英国必须控制的地区,承认叙利亚为法国控制的地区外,还明确地谈到了“阿拉伯问题”。《德邦森报告书》第7条写道:“保证阿拉伯半岛和穆斯林圣地由独立的穆斯林(政治实体)统治。基于此,我们将探索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将能引起印度穆斯林的兴趣,或至少不至引起他们的反对;这个办法将为哈里发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结论。”<sup>[7](p.26-27)</sup>《德邦森报告书》中的“独

立的穆斯林统治”的概念是极为模糊的，对它的性质、范围并没有明确解释。但是，可以肯定，它并不意味着一个统治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此时英国已经与沿岸及其内地、英国直接占领地亚丁周围的大大小小的酋长们签订了协议，迫使他们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德邦森报告书》第 3 点专门谈到了英国在这些酋长国内的利益，要求贯彻“已经给予的，或者正在考虑的”的许诺，即给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而英国掌握他们的对外事务。

最早把“独立的穆斯林统治”解释为“独立的主权穆斯林国家”的是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1915 年 4 月 14 日格雷给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 麦克马洪一信，并让他转告英国驻苏丹喀土穆高级专员 温盖特：要使阿拉伯人知道，“英王陛下政府将保证，缔结和平条款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阿拉伯半岛和它的穆斯林圣地将保持在一个独立的主权穆斯林国家手里。”但他又补充说：“在这个阶段，确切的多少领土应该包括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可能确定的。”<sup>[10] (209)</sup>

英国“不干预阿拉伯半岛事务”的许诺远远不能满足侯赛因的要求，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侯赛因一方面借口受到来自埃及和苏丹的英国军队的威胁，拒绝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表示公开支持，一方面又加紧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行联系。1915 年春天，侯赛因令他的第三子费萨尔以因公出差为名，北上到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探测奥斯曼当局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双方的意向。该年 3 月底和 5 月底，费萨尔两次在大马士革停留，在那里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阿赫德和法塔特建立了联系，并同他们签订了一个联合议定书，史称《大马士革议定书》。该议定书向英国提出了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条件：“大不列颠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它的疆界包括西奈半岛以东和以北的、说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 三、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阿拉伯世界分裂、动荡的火种

1915 年 7 月 14 日，侯赛因根据《大马士革议定书》致信英国驻开罗的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从此正式揭开了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序幕。双方共交换信件 10 封，延续到 1916 年 3 月。在 7 月 14 日的第一封通信中，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人与英国结盟的条件是：（一）英国承认下述疆界内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北界，自梅尔辛—阿达纳—乌尔法—马尔丁—阿马迪亚，直到波斯湾边界；东界，从波斯边界至巴斯拉湾；南界，印度洋（亚丁仍为英国属地）；西界，沿红海、地中海到梅尔辛。（二）侯赛因政府承认英

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 15 年经济上的优先权。（三）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签订联合防御条约。（四）英国同意废除外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的特权。最后，侯赛因向英国提出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要求英国政府在“30 天内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假若英国的答复超过了这个期限，他们将采取自由行动”。<sup>[11] (3-4)</sup>

英国并没有被侯赛因的“最后通牒”所吓倒。直到 8 月 30 时，麦克马洪才给侯赛因以“否定”的答复，声称“在激烈的战争期间花费我们的时间对边界问题那么详细地进行讨论显然不成熟”，而只是表示，英国愿意随时给予阿拉伯人起义以物质上的帮助。

侯赛因在 9 月 9 日对麦克马洪 8 月 30 日的避而不谈边界问题的信表示了不满，再次强调确定边界的重要性。侯赛因指出，麦克马洪的答复“意义是含糊的，调子是冷淡的和犹豫不决的”，推迟讨论边界问题是“没有用的和浪费时间的”，强调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人的权利问题是英、阿谈判的关键问题，需要首先讨论。

此时英、法在中东战场的接连失利有利于侯赛因在谈判中提出较高的要价。1915 年春天，英、法联军在加利波利半岛遭到土耳其和德国军队的优势火力和顽强抵抗，损失惨重，1916 年 1 月被迫从海峡区域撤退。在苏伊士运河区域，在 1916 年以前英军一直处于守势。在美索不达米亚，汤申德率领的一支英国大军手 1915 年 11 月在巴格达南面吃了败仗，并于 1916 年 4 月在土耳其第 6 军的围攻下在库特阿马拉投降。

迫使英国在谈判中作出让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增强和阿拉伯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当时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土耳其军队中大部分士兵是阿拉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耳其军队几乎全部由阿拉伯人组成，而民族主义组织阿赫德在土耳其军队中的阿拉伯士兵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英国通过秘密接触阿赫德领导人法罗奎，认识到阿拉伯民族并不是一个“思想里没有团结概念”的民族；阿赫德和法塔特都已正式宣布：忠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土耳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的独立。1915 年 10 月 12 日，约翰·马克斯韦尔将军在给伦敦陆军部的电报中说：“在军队和阿拉伯酋长中有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有力的组织，即青年阿拉伯委员会，似乎已决定：行动的時刻到来了……假若他们的提议被拒绝，或者继续推迟答复，那么这个阿拉伯组织就会投向敌人的怀抱并配合他们工作，这将意味着马上激励起宗教感情，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真正的圣战。”基钦纳不到 24 小时就回电马克斯韦尔将军：“政府渴望着在使阿拉伯人满意的情况下处理阿拉伯

问题。请电告我关于他们的主要要求及他们与麦克马洪讨论的情况。你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阻止阿拉伯人对英国传统忠诚的疏远。” [3](p.246)

英国中东战场的失利和秘密接触法罗奎，不得不对侯赛因的关于阿拉伯国家的疆界和地位要求作出答复。10 月 18 日，麦克马洪就答复信件的内容请示外交部：“英国承认阿拉伯人独立的原则，即在英国的指导和控制下，在麦加的谢里夫所宣称的疆界内，在不损害她的盟国的利益的范围内英国可以自由行动。”10 月 20 日，外交部致麦克马洪的答复信，详细列出了英国在与阿拉伯人谈判中需要“保留”的清单：“你可以按照你所建议的方针，除了有关我们的盟国的保留外，给予热诚的保证。……关于阿拉伯半岛和圣地，没有保留，你说起来没有困难。对北部、西部边界，你无论如何必须提出普遍的保留。至于美索不达米亚，所提出的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即巴士拉省，由于在巴格达省的特殊利益而需要扩展，实际上是要占领的地区。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签订的那些条约当然要维持不变。” [3](p.247)

麦克马洪接政府指示后，为阻止阿拉伯人的疏远，于 10 月 24 日致函侯赛因，以复杂难解和模糊不清的措辞对他提出的疆界要求提出“修正”后予以“保证”：

“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两个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不能被视为纯粹的阿拉伯地区，应该被排除在所要求的疆界之外。由于上述修正，而且不得损害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所签订的条约，我们承认那些疆界。在不损害其盟邦法国利益的边界以内的地区中大不列颠可以采取自由行动，至于这些地区，我受权代表大不列颠政府提供下列保证，并对你的来信回答如下：

1，经上述修正，大不列颠愿意承认和支持由麦加谢里夫所要求的疆界内的阿拉伯人的独立。

2，大不列颠将保证圣地免受任何侵略，并将承认它的神圣性。

3，当局势许可时，大不列颠对阿拉伯人提出建议并帮助他们在那些地区建立合适的政府形式。

4，另外，应当理解，阿拉伯人已经决定仅仅寻求大不列颠的建议和指导。同时，为采取英国的行政管理方式所需要的欧洲顾问和官员，也将都是英国人。

5，就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来说，鉴于大不列颠在那里已确立的地位和利益，阿拉伯人将承认，那里须要作特别的行政安排，目的是为了这些地区免受外来侵略，为当地居民谋求福利和保证我们之间的经济利益。” [3](p.8)

侯赛因在 11 月 5 日给麦克马洪的信中同意把梅尔辛和阿达纳两个地区排除于阿拉伯国家疆界之外，同意英国在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享有的特殊地位，还愿意尊重英国与阿拉伯酋长们所签订的条约，但坚持认为“阿勒颇和贝鲁特两个省以及它们的沿海纯粹是阿拉伯人的”。

关于侯赛因对阿勒颇和贝鲁特两个省区所持的强硬态度，麦克马洪在 12 月 14 日的信中的回答是：“由于这两个省区涉及到我们的盟邦法国的利益，所以需要慎重考虑，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将来适当时期通知你。” [3](p.12)

侯赛因在 1916 年 1 月 1 日的信中同意把“涉及法国利益的贝鲁特和它的沿海地区”留待战后解决，但声明，“贝鲁特居民将永远不会同意这样的肢解……，在那些地区，决不对法国或任何其他大国作丝毫让步，决不放弃一寸土地”，“我们认为，一俟战争结束，我们应该向你们要求现在留给法国的贝鲁特和它的沿海地区”。 [3](pp.13-14) 在此后两个月的三次通信中没有再谈起边界问题，双方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对土耳其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实际措施上。1916 年 6 月 5 日，侯赛因率众起义，并自称为“阿拉伯国王”。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是一个长期引起争论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无论是法罗奎—克莱顿谈判，或者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都没有专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人确信巴勒斯坦是包括在英国所许诺给阿拉伯人的地区内的，可是英国政府却拒绝承认曾经把巴勒斯坦许诺给阿拉伯人，其理由是在通信中“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是排除在侯赛因所要求的疆界之外的。然而阿拉伯却争辩说，巴勒斯坦实际上并不在大马士革以西，而是在大马士革的南部。而英国人分辩说，英语中的 district (地区) 在通信中的意思是和土耳其语的 vilayet (省) 的意思是一样的，大马士革地区，就是指的大马士革省，即叙利亚省，因为大马士革是大马士革的首府。巴勒斯坦正是大马士革省的西部的“叙利亚部分”。而阿拉伯人反驳说，即使大马士革“地区”就是叙利亚省，阿勒颇“地区”就是阿勒颇省，但历史上从来没有“霍姆斯省”和“哈马省”；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都属于叙利亚省的城市；而且，麦克马洪在通信中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两省时，使用的是 vilayet 而不是 district；更何况巴勒斯坦的最重要的部分是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它既不属于阿勒颇省，也不属于大马士革省或贝鲁特省，如果把巴勒斯坦排除在外，就应该在信中提到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

在西方有一个流行的看法，特别是在美国，认为

英国人原来是想把巴勒斯坦包括在许诺给阿拉伯人独立的地区之内的。美国学者阿马加尼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由于 1964 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披露了供研究用的《韦斯德曼文件集》，这一场有名的争论可能得到解决。那个集子收入了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是英国外交部情报局准备的供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用的。这两个文件……落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威廉·韦斯德曼的手里。该文件明确说明巴勒斯坦包括在英国向阿拉伯人所作的保证之内。”<sup>[10](p. 249)]</sup>但是，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该文件系备忘录，体现情报局顾问们的意见。不管这些文件多么有根有据，但它们绝不能构成英国政府的成熟观点，正如国务院相类似的备忘录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成熟观点一样。

关于这个激烈争论的问题，麦克马洪曾于 1937 年 6 月 23 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一个关于“麦克马洪许诺”的声明，“我没有想把巴勒斯坦包括在许诺给侯赛因的阿拉伯人独立地区内。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国王侯赛因实际上充分理解我的许诺是不包括巴勒斯坦的。”<sup>[9](p. 19)]</sup>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某些秘密情节至今仍未完全为世人所知。这些信件总共 10 封，其中双方各写 5 封。麦克马洪的英文原件在开罗官邸译成阿拉伯文后送交侯赛因，侯赛因的阿拉伯文原件到达开罗后译成英文。1939 年 2 月，来自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政府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从 1939 年 2 月 7 日到 5 月 17 日，双方在詹姆斯宫共举行了 14 次会议，以巴勒斯坦会议而著名。在这期间，英国将麦克马洪信件的 10 封英文复印件和 7 封阿拉伯文复印件交给阿拉伯代表团，并随后公之于众。英国政府声称，编号为 1、3、8 的 3 封信件“在外交部的档案里没有找到”。其中编号为 1、3 的为侯赛因信件，编号为 8 的为麦克马洪信件。所能见到的 3 封侯赛因的阿拉伯文信件都没有署名。所公布的 10 封英文信件均注明是“译文”，其中 5 封为麦克马洪所收到的侯赛因信件的英文译文，另外 5 封为麦克马洪的阿拉伯文信件的英文译文。

就所公布的麦克马洪信件分析，英国政府和麦克马洪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第一，麦克马洪从来没有许诺侯赛因作为他所要求的地区的统治者。第二，“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第三，麦克马洪在 1915 年 10 月 24 日的信中有一个突出的附带条件，即“在不损害他的盟邦法国的利益的边界

以内的地区中大不列颠可以采取自由行动，至于这些地区，接受权代表大不列颠政府提供下列保证”。第四，麦克马洪提出，“大不列颠将保证圣地免受任何外来侵略并承认它的神圣性”。

从《德邦森报告书》和基钦纳劝说侯赛因反叛奥斯曼帝国的电报看，英国是不允许肥沃新月地带的阿拉伯人独立的。而 1915 年 10 月 20 日英国外交部给予麦克马洪的指示是：“关于阿拉伯半岛和圣地，没有保留，你说起来没有困难。对于北部、西部边界，你无论如何必须提出普遍的保证”。为了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排除在侯赛因所要求的疆界之外，麦克马洪在致侯赛因的信中有意用了大量的富有伸缩性的、模棱两可的、有时是自相否定的措辞，以致侯赛因对英国许诺的错误理解。事实上，许多直接参与其事的英国官员对麦克马洪蒙骗侯赛因的意图都有过论述。阿拉伯起义军的英国顾问 T·E·劳伦斯曾写道：“我不但不为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反而不断地感到非常惭愧。……很明显，如果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的话，这些诺言将是一张废纸。假若我当了阿拉伯人的可靠顾问，我一定会力劝他们回老家去，不要把性命当儿戏了。”<sup>[11](p. 24)]</sup>在约旦创建并指挥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格拉布也曾写道：“在这一系列的通信中，看来英国方面始终认为谢里夫侯赛因的要求是太过分了。英国方面把他看作一个地方的阿拉伯王公，他由于起而反抗土耳其人而获得了汉志的统治者的地位，已经应该心满意足了。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信中主动提出英国保护圣地不受侵略这一事实，说明了英国方面认为，如果能使谢里夫保持住汉志的统治权，他就会很知足了。谢里夫要求除了汉志以外还要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大概是被认为很荒谬的。”<sup>[12](p. 50)]</sup>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赛克斯也写道，在巴勒斯坦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感到英国人“用巧妙的欺骗手法”使自己在那里站住脚跟。<sup>[13](pp. 84-88)]</sup>直接参与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英国驻开罗情报局局长克莱顿，在 1916 年春天写给英国驻喀土穆高级专员温盖特的信中谈起与侯赛因的通信时说：“幸运的是，我们极为谨慎地什么也没保证。”<sup>[14](p. 72)]</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阿拉伯独立和统一的梦想彻底破灭了。阿拉伯人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看作是一个骗局，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一个词比帝国主义更卑贱或者更受人唾骂的了，连麦克马洪本人也不敢承认自己参与“阿拉伯运动”是一件光彩的事，自称那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

注 释:

1882—1994 年, 英国占领下的埃及名义上宗主权仍属奥斯曼帝国, 实际上英国驻开罗总领事是最高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 英国驻开罗总领事改称最高专员。英国驻开罗第一任高级专员为亨利·麦克马洪。

英法意三国于 1917 年 1 月 3 日用联合照会通知侯赛因, 三国只承认他为汉志的国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英国的保护下, 侯赛因的两个儿子费萨尔和阿卜杜拉分别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国王, 而侯赛因则被英国支持下的沙特国王赶出汉志。

英国驻开罗阿拉伯事务局官员, 阿拉伯起义军英国顾问, 利用阿拉伯人反对法国占领叙利亚, 以“阿拉伯人的劳伦斯”而著名。

参考文献:

- [1] Z Zeine,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Beirut 1960).
- [2] Norman Rose, ed., From Palmerston to Balfour(Frank Cass and Co. LTD, 1992).
- [3] Ronald Sander, The High Wall of Jerusalem.
- [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New York 1965).
- [5] Bruce W estraite, Arab Bureau: British Policy in Middle East, 1916—1920(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2).
- [6] Ronald Storrs,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New York 1937).
- [7] J.C. Hurew itz, 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 2.
- [8] Ruth Lapidoth, and Moshe ed., The Arab- Israe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Martinus N ijhof Publishers 1992).
- [9] Ruth Lapidoth and Moshe Hirsch ed., Arab- Israel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 [10] Yahya Amajani, Middle East, Past and Present(New York, 1970).
- [11] T.E. Lawrenc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New York 1938).
- [12] 约翰·巴格特·格拉布. 英国和阿拉伯人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 [13] Christopher Sykes, Crossroad to Israel(New York, 1965).
- [14] Elie Kedourie,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New York, 1970).

(上接第 69 页)

现, 而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是逐渐瓦解南方传统的家长主义思想体系的利器。布鲁斯音乐承认爱的肉体一面, 我行我素地寻求被上南部白人乡村音乐丢失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布鲁斯和即兴舞是下层黑人在追求中产阶级黑人试图抛弃的狂野和反抗中创造的黑人文化的新美学, 黑人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下层黑人的这种“黑化”坚持中得到保持和发扬。正如著名布鲁斯歌手玛·蕾妮 (Ma Rainey) 大声唱的: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海洋, 就不要在我的海里钓鱼。

不要喜欢我的海洋, 不要在我的海里钓鱼。

离开我的山谷, 让我的山岳依旧。

参考文献:

- [1] [美] 托马斯·索威尔. 沈宗美译. 美国种族简史.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2] Howard N. Rabinowitz, Race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outh, 1865-18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 William J. Cooper, The American South: A History (Volume 2),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 [4] Nunan V. Bartley, The Creation of Modern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 [5] Edward L. Ayers, The Promise of the New South: Life after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92.
- [6] 陈永国. 美国南方文化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 [7] Tera W. Hunter, To 'Joy My Freedom - Southern Black Women's Lives and Labors after the Civil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